

新时代运动与文化治疗 ——《文学与治疗》及《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述评

王玥玮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早在精神分析作为现代的精神医学——心理学诞生以前很久,文学艺术作为个体和社会的诊疗途径便一直发挥着作用。面对现代性的个体心灵危机与社会冲突,文化的诊断与治疗功能日益凸显。在此方面,“新时代运动”引入文化他者作为西方社会的治疗秘方,形成当代治疗实践的典范。

关键词: 现代性危机; 新时代运动; 文化治疗; 文化寻根

Abstract: Literature had been used as a means of therapy both individually and socially long before the birth of modern psychology with it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wing to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conflicts of contemporary world, literature's func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New Era Movement" introducing other cultures to be therapy for the west society sets an example for contemporary therapy practice.

Key words: modernity crisis; New Age Movement; cultural therapy; cultural root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4-0119-8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4.011

本文试图通过对叶舒宪教授的两本著作——《文学与治疗》[1]与《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2]的述评,来探讨一个问题: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普遍的心灵危机与文化治疗之间的关系;并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于西方世界并逐渐全球化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为例,来切入这一主题。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得知自己被誉为“无意识的发现者”时,放弃了这个荣誉,他认为无论自己对于系统地理解无意识世界做过怎样的贡献,荣誉都应归功于那些文学大师们[1: 284]。^①文学被称为“人学”,就是因为它一直以来都在以极具艺术性的象征符号表达并探讨着人性,而文学表达对于叙述者和阅读者都具有丰富的自我诊疗意义。叶舒宪教授主编的《文学与治疗》一书的主旨,便是再现和重申文学与文化对于

^① 参见[美]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艺术与精神病(Art and Neurosis)》,亚当斯编《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

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疗救作用,并探讨这一功能的发生机制与原理。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认为,文学的自我诊疗作用在于通过符号系统来再现自己无意识层面的妄想,从而当面看到那些危险的、分裂的力量发挥作用的过程[3:28]。这种叙述疗法的原理与特纳所说的仪式过程(passage of rite)相似,都是通过反归自身(reflexive)的表演来呈现冲突并解决危机,完成社会过程和个体心理状态从失序到重建的过渡[4:80-81]。文学艺术与仪式表演都是作为符号系统对无意识领域加以再现,与诗意相距更近,正因为如此,才与超越理性的“灵性”关联密切。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挤压非理性的过程,社会努力地试图实现理性化,而这将带领人们进入现代性的铁笼,也就是理性的铁笼。过度迷恋理性导致的是人类心灵的自我囚禁,而这正是现代人出现心灵异化和精神分裂的原因。文学、艺术、神话、朝圣仪式、返归自然等实践活动,由于构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故而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导致人们用主观经验取代客观经验[5:33],更接近“无意识”领域,而无意识领域则是个体精神危机的源头。这种对于理性的“逆反”,在海德格尔那里以“诗意的栖居”表达出来,即那种未遭理性戕害的精神生活方式,而这种对于精神的现代疾患的关注以及对理性的反思,自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来,便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主题[1:2-5]。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中,文学艺术对于个体精神升华的作用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无论是《荒原狼》中通过与歌德、莫扎特等人的灵魂进行神交的哈里,还是《知识与爱情》中通过流浪旅程和雕刻圣像获得精神领悟的浪子戈特孟,或者《艺术家的命运》之中饱受精神困扰的画家约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在文学和艺术的表述与创造中发现自我和人性,而这种发现自我的历程在黑塞小说的结尾都会被提升到接近“梵我合一”的印度教精神层面。黑塞本人就是在寻求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对话并通过文学创作而得以自我疗愈的。他的最后作品《玻璃珠游戏》是他一生精神寻觅之路的自我呈现。

文学艺术的诊疗作用,在于其所具备的想像与美学力量有一种超越于庸常现实生活的“灵性特质”,这种特质与神秘主义类似,都是对理性的反思与超越。萨特在《想象》中说,“想象具有一种‘超越和归零的力量’,使得个体能够逃脱被‘淹没在现实中’,将他们从既定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成为别的什么,而不是他们看上去可能被造就的样子。”[6:4]人类学家利奇和特纳也为想象辩护,特纳在仪式的结构分析中说,他性(otherness)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结构之间的缝隙中,它威胁着结构,促使结构解体、向反结构发展,再形成新的结构,社会由此在动态中保持平衡[6:5]。^①

① Victor Turner, *Dramas, Fields, Metaphors* (1974), *The Ritual Process* (1982) 转引自[7:5]。

利奇则更为明确地将人的本质确认为“灵性个体”,即人具有怨恨僵化和控制以及运用创造力反抗现有体系的本性,正是这种创造力本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产生。

对现代性和理性的反思与诊疗,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新时代运动”的主题,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的学习,通过跨文化对话的方式,寻找着整合和灵性的道路,试图以此来超越对立,完成人类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并探索人类从理性到超越理性的可能性。^①《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学界系统研究和介绍新时代运动的唯一一部著作,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意义。那么,何谓“新时代运动”?对于它的认识和探索,是否具有意义?“新时代运动”与中国有相关性吗?这种相关性是否具备让我们对之倾注大量探究和比较的潜力?

“文化寻根”是二战以后率先在西方社会兴起的文化运动,如今已经拓展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而“新时代运动”是这一大规模文化运动的典型代表,波及当今世界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作为社会事实或生活方式的出现,约在17世纪,奠定了现代性及其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如祛魅、理性、世俗化、个体、自由、进步等。正是这些话语在不断为发展主义、资本积累、商品经济、文化殖民以及全球化提供着合理性。然而,在这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让人们对现代性与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开始动摇甚至崩解,“寻根的实质,就是西方文化再认同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成为西方人反思与再认同的镜子。”[2:3]文化寻根,或者说新时代运动,相当于反现代性的一次新启蒙。

现代性和风险是相伴而生的。现代性的风险,表现出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频繁性和人为性。现代性是双重的,既是“完美”又是“罪行”,既是“甜蜜”又是“悲哀”[2:31]。但是,由于现代性之“罪行”与“悲哀”的毁灭性,“完美”和“甜蜜”才在这种对立的代价中显得脆弱而渺小。于是,20世纪后半叶,反现代性在哲学、文学以及社会文化运动中,以各种新颖的形式表现出来。最普遍的一种提法便是“后现代性”,以体现其对现代性的继承与背反。关于后现代的哲学态度,以法国和美国为两大阵营[7:第七章]。前者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怀疑主义和主体无意义为主要观点,后者则普遍呈现出关于“抵抗”的乐观主义以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新时代运动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历三十多年的迅速发

① 关于“前理性—理性—超理性”的论述,请查阅整合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创始人肯·威尔伯(Ken Wilber)的诸多著作。

展,从西欧和北美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风靡全球的反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影响所及,在学术、思想、宗教、科学、法律、商务、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领域都引发出巨大的冲击波。新时代运动的前身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嬉皮士运动,如今成为对抗物质主义的超越种族和国界复归东方思想和原始宗教(以萨满教和巫术为代表)的精神觉醒运动和泛生态运动,以“灵性”“治疗”“整合”等观念为依托,试图在传统基督教信仰之外重新找回人类与宇宙自然的精神和谐状态[2:31-34]。

对待新时代运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托夫勒基于帝国主义诗学的“新的黑暗时代”说,即认为是继共产主义之后与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治体系相敌对的潜在力量。而另一种态度来自研究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普遍持有“同情之理解”[2:40]。新时代运动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东方宗教以及异教、神话、巫术的复兴将成为进入西方世界的一股强大的文化势力,但新时代运动从历史循环的哲学来看待和迎接这一整合的趋势,认为这不是冲突和黑暗的时代,恰恰意味着希望和变革。至于新时代运动的性质,叶舒宪教授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场民间社会文化运动,而不是纯粹的新兴宗教运动,因为它“既无统一的教义也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领导”[2:44]。用玛丽琳·弗格森的判断:它是一场正在全球范围各个领域发生的不约而同的共谋,目的是在宝瓶时代通过促进人类意识的提升而推动人类与地球的转变,带领人类走向一个追求心灵真正自由与解放的新时代[8:14]。

新时代运动在文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体现出三大转向(原始、东方和自然)的精神追求,并呼应着一批有“新神话主义”色彩的理论著作。^①比如关于玛雅文明预言的《赛莱斯廷预言》,关于印第安巫师的“巫师唐望三部曲”,以凯尔特巫术传统为背景的《哈利·波特》,众多身心灵疗愈、自愈的书籍,高僧大德写就的给予现代人以精神教育的宗教书籍,以及远行朝圣、复返自然的书籍和影片等。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全面梳理和批判了文学作品中的东方主义。新时代运动中的文学作品,是否正是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所针对的类型呢?叶舒宪教授在本书中以20世纪印第安文化复兴热潮以及写作“巫师唐望三部曲”的卡斯塔尼达的观点对此做出回应,认为这种文化复兴热潮与西方19世纪的东方学的意旨类似,是为了恢复人性中已经失落的、但本就存在的那一部分(就像荣格说的“自性”)。

① 这在荣格、米哈伊尔·伊利亚德和约瑟夫·坎贝尔的心理学、宗教学和神话学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这类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帝国逻辑,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对话和时代转换的前兆?叶舒宪教授认为,对于新时代运动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评论缺席的现状,选择一个切入点来讨论这些文学艺术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反思与重构,掀起一场新时代运动的“黑色风暴”。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是《黑色雅典娜》和《黑色上帝》,它们挑战的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观点,把真正的起源转移到非洲大陆。这两本书的出版,与“东方学”作为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关。《黑色雅典娜》的作者伯纳尔作为后殖民批判的一员,把批判西方文明话语的矛头指向解构西方身份的立场上,解构的方式便是证明西方文明援以为根的希腊文明的源头来自非洲和亚洲,他把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解构向前推进了一步,即“重构东方学,使它成为与西方学不可分割的知识,成为重新理解的西方文明史的基础”[2:75]。新时代运动的作品,重构、建构的趋向很是明显,这正是“后现代之后的建构主义”[8:第七章]的显著特点。另一本与之类似的著作是《黑色上帝》,它除了用知识社会学方法揭露知识伪装以外,也利用杜梅齐尔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证了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与东北非的风暴神是同源关系这一论点,从而把西方文明之根转移到了“非洲亚洲宗教共同体”[2:79-81]。这些重构文明起源论的学术书籍,表现出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在文化身份上破除东西对立与整合东西方传统的渴望[2:82]。

“凯尔特复兴”是西方新时代运动的另一个取向,指的是不从西方文明之外寻找他者,而是从西方文明内部寻找被忽略的文化源流,也就是在希腊和希伯来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两个脉络之外再加上一个脉络,即“凯尔特文明”。凯尔特民族分布于盎格鲁—萨克逊人到来之前的英伦诸岛,包括今日的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神话、巫术、魔法、灵性的特点。前基督教时代的凯尔特信仰被称为“德鲁伊特教”,以其领袖德鲁伊特命名,他们集合萨满—巫师、医生、诗人、祭司、哲学家、法官、占卜师和王者的智囊高参于一身。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诗人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文化复兴”,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巫术和神话的“复魅”,以及凯尔特民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凯尔特文化的复兴成为新时代运动中凯尔特族群和非凯尔特族群共同推进的一股文化潮流,既体现在学术界(牛津大学的“凯尔特研究”专业),也体现在文学艺术(叶芝、乔伊斯等大作家的作品)、政治(苏格兰民族自决运动)和文化产业(《哈利·波特》系列、恩雅的音乐)当中。

新时代运动包含了诸多“原始情结”。

人们惯于在对当下人类现状感到厌恶和迷茫的状态中,向自己民族的古老时代或者与自然更为贴近的他者文化寻求拯救和启迪。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原始取向与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野兽派、表现主义(如高更、毕加索)有密切关系,其背后是两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的“文明世界”的残忍与荒谬,艺术家想要体现“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高贵”。新时代运动所指涉的“原始情结”不是退回到古代,而是指两个方面:首先是解构“原始”作为价值判断的歧视性概念,是重现“原始”与“现代”的内在连接。这一连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延续性,技术的进步、现代理性的进步与灵性的退步、感应自然与统一的能力的退步,二是指人的内在自性,既包括原始的萨满主义的物我合一的灵性,也包括启蒙运动所言的现代理性;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对原始哲学的整体观和统一性见解,来为当下矛盾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体现出僵化的对立观的现代理性提供参照。作为“拯救者”的“原始性质”,既可以在消失的文明中找到,还可以在世界现存原住民族中找到,也可以在人的自性中找到。1974年出版的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的著作《寻找原始人》便是呼吁通过原始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来为现代性危机寻找出路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他提倡“寻根”和“变革”,认为只有解决原始与文明的冲突,才有可能治愈历史的创伤,才有可能解决文明所带来的异化和血腥。

“女神复兴”是新时代运动的另一个主题,这一趋向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有关。“女神复兴”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以及为异教正名的哲学运动密切相关。女神信仰往往与巫术、异教有关,在早期基督教中,这些思想都是迫害的对象。心理学家荣格则从这些“异教”思想中看到了精神医疗的能量,认为藏传佛教、禅宗、易经、道家哲学和炼金术等都可以成为对西方传统思想进行改造的宝贵资源[2:125]。荣格发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中普遍存在着母亲原型,而神话中的女神则是其主要的表现。这个命题给当代神话学带来很大刺激,也为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合搭建了桥梁[2:126]。“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挑战了世界的神圣性来源是上帝这一基督教信仰,也用它内在的地球—母亲—有机体逻辑批判了人类对于生态进行掠夺的逻辑合理性。对于女神、女巫的信仰的复活,试图解释生态掠夺、屠杀和战争的反人性和非理性,希望创造出一个与人类原始本性相统一的生态观和文化观。

新时代运动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东方转向”。“东方转向”与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不同,东方主义是“东方转向”中比较保守、僵化的类型。东方学批判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文化形象背后的实际存在的权力结构,揭露了浪漫想象背后的冷酷的索取心态和冷漠的私我主义。叶舒宪教授曾引用日本学者儿玉实英在《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中分析垮掉派诗歌

时所提出的美国诗人对待日本文化的三种态度:以西方价值观为根基、为日本“异国情调”所倾倒的“保守派”;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伦理观和相对主义认识论的“世界主义者”;以及对西方文化完全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日本文化膜拜者[2: 146 - 147]。^①指出三类人中只有第一种接近萨义德所批判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2: 147]。因此,新时代运动的“东方转向”与东方主义不同。新时代运动在知识界的生命力,使之成为规避偏颇的异国情调式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思索新时代运动需要回到中国语境。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大规模出现“寻根”一词,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自觉提倡一种文学寻根运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便是这一运动的宣言[9: 350]。这里所寻的“根”,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故乡”,绝不仅限于祖籍来源和家族继嗣,而是一种与疏离的现代城市生活相反的厚重、深沉、悠久且美丽的人类乡土,具有一种“灵魂来源”的情感本质与宗教色彩。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的诱惑与重建时代的怀疑与热情,共同摆在人们的面前,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共存的世界,这些困惑和考验对于各地的人们都是一样。因此,寻根、他者和整合的、多元性的精神体系,便成为了人们共同的追寻。

《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结尾,总结了新时代运动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并表达作者对于身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的态度。从卢梭的复归自然理想算起,文化寻根从启蒙时代开始就是现代性话语谱系之中的一个维度。新时代运动成为西方文化内部用思想整合、灵性探索、文化多元主义来抵抗工具理性霸权的一种复魅方式,要求重建感性、诗性、神性的文化,对现代性的科学主义予以补充与校正[2: 219]。这些见解旨在倡导重新认识全球化与地方化、科学与灵性的对立,相当于后现代的“再启蒙”。

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认为,宗教性是普遍的人性,“宗教的人”(Religious People)不仅是古代社会人们通过对空间、时间和自然的圣化,对宇宙的神圣性的不断再现,而且使自己的存在状态符合宇宙作为神圣存在的本体论,在自身的微观宇宙中实现着神性的永恒回归。对于现代人而言,尽管人们在现代理性的驱动下拒绝承认人类生存状况以外的任何存在模式,强调人类对于自我的创造性,但是,这种人的宗教性却始终存在着,即使自认为不信宗教的人,也都藏有非命名性的准宗教(Pseudo religions)和已经退化了的神话。世俗之人由宗教的人蜕变而成,他不能消灭自己的历史[10: 122]。而现代的非宗教徒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彻底的“去宗教化”,

① 儿玉实英《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转引自[2: 146 - 147]。

来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事实证明,虽然非宗教徒获得了一些方面的自由,但是在另一个维度上,却遭遇着其它方面的束缚和虚空状态。伊利亚德认为理解宗教徒的精神世界,对于非宗教徒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会从中发现纯粹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并且发现我们所谓的“世俗主义”实际上具有的与宗教世界相似的逻辑结构。同时,每个人的意识又都是由他的有意识的活动和非理性的体验而构成的。“他的无意识的内容和结构也表现出了与神话的思想和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0:125]非宗教徒在行为上所表现出的与宗教徒行为的结构相似,与他的无意识结构中存有的宗教祖先留存下来的宗教记忆有关。这一深刻的洞见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文化寻根运动之普遍性、必然性,提供了主体方面的解释。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即心灵危机与文化治疗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新时代运动通过形形色色的他者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反思与再认同的实践,本身就是现代文化通过跨文化对话进行自我诊疗的过程。虽然在这一运动中同样包含了关于权力、意识形态、时尚潮流的盲目性等等需要辨析和批判的要素,但是,新时代运动具有的自我反思性质,正是其文化活力所在。而这种文化治疗的功能,在全球化到来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是一味地追随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还是兼顾在西方文化寻根运动中新催生的“原始理想”或“原生态理想”,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鱼和熊掌难题。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主编. 文学与治疗[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叶舒宪. 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 [3] [法]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M]. 怀宇,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7.
- [4] Turner, Victo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M]. NY: PAJ publications, 1988.
- [5] Frye, N. . *Literature as Therapy, The Eternal Act of Creation* [M]. ed. By R. D. Denha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 [英]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版) [M]. 鲍雯妍,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 [7] [英]杰拉德·德兰蒂.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知识、权力与自我[M]. 李瑞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8] [美]玛丽琳·弗格森. 宝瓶同谋: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聚变[M]. 廖世德,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
- [9]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罗马尼亚]米哈伊尔·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M]. 王建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